



大学用书

经学历史

[清] 皮锡瑞 著 周予同 注释

中华书局

.. 013039730

Z126

36-3

1 8 4 2 4 1 8

经学历史

[清] 皮锡瑞 著 周予同 注释



Z126
36-3

中华书局



北航

C164767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学历史/(清)皮锡瑞著;周予同注释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9

(大学用书)

ISBN 978-7-101-08822-9

I. 经… II. ①皮…②周… III. 经学-历史-中国
IV. Z1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7140 号

书 名 经学历史

著 者 [清]皮锡瑞

注 释 者 周予同

丛 书 名 大学用书

责任编辑 张继海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94 千字

印 数 1-3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8822-9

定 价 20.00 元

序 言

一 经学的三大派

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是经学入门书籍，可以说是“经学之导言”；本篇的任务，在介绍《经学历史》于读者之前，那不过是“经学导言之导言”而已。然而因为是经学导言之导言，所以不能不对于经学先作鸟瞰的说明，以便显出经学史的重要性和本书的价值。

中国经学，假使我们慎重点说，上追到西汉初年为止，也已经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。这二千多年中，经部书籍，因为传统的因袭的思想关系，只就量说，也可以配得说“汗牛充栋”。不说别的，我们只要一看纳兰性德汇刊的《通志堂经解》，阮元、王先谦汇刊的正、续《清经解》，也几乎使你目眩；至若列举朱彝尊《经义考》的书目，那真所谓“更仆难数”了。但是，假使我们能够应用史学家处置史料的手段，这许多繁重的著作，也不过可以归纳为三大派，所谓“经学的三大派”。这三大派都显然自有它的立场和特色；就我的私意，可称为一、“西汉今文学”，二、“东汉古文学”，三、“宋学”。

西汉今文学发生在西汉，就是所谓“今文十四博士”之学。在西汉时代，因为统治阶级的利用和提倡，在学术界几有独尊之势。后来因为古文学的暴兴，和郑玄、王肃的混乱家法，便渐渐衰落。延到曹魏、西晋，因为政乱和胡祸的过烈，连仅存的章句传说也多随兵燹而渐灭。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叶，因为社会、政治、学术各方面趋势的汇合，于是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活，居然在学术界

有“当者披靡”的现象。当时所称为“常州学派”、“《公羊》学派”，就是这西汉博士的裔孙。现在清朝覆亡已十六年，但这今文派的余波回响仍然在学术界里存在着，并且似乎向新的途径发展着。

东汉古文学，稍为慎密地说，可以说是发生在西汉末年。到了东汉，因为今文派自身的腐化和古文学大师的努力，大有取今文学而代之之势。郑玄、王肃虽说混淆家法，但究竟左袒古文学，所以魏、晋时代，今文学亡灭，而古文学反日趋于发扬开展。后来六朝的南北学，隋、唐的义疏派，虽然虚实繁简不必尽同，但立场于古文学却无差异。一直到了北宋庆历以后，经学上的怀疑学派——宋学——崛起，于是这正统派的古文学暂时衰歇。但明代末期，因为姚江学派流于虚妄，和清廷思想压迫政策的实现，于是顾炎武扛了“舍经学无理学”的大旗来复兴古文学。清代三百年学术界的权威，便被这一派所独占；所谓以惠栋为领袖的“吴派”和以戴震为领袖的“皖派”，都同东汉古文学有着血统的关系。

宋学的怀疑精神，唐代经师如啖助、赵匡、陆淳辈已开端绪；但这种风气的盛行，却不能不说在北宋庆历以后。到了南宋，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，虽可分为以朱熹为领袖的“归纳派”，以陆九渊为领袖的“演绎派”和以叶适、陈傅良为领袖的“批评派”三派；但前二派立足于哲学的见解，以理欲心性为论究的对象，而借助于经学的解释，却并没有不同。元、明以来，归纳派的朱学，因为朝廷的提倡，侥幸地取得正统的地位；而演绎派得王守仁（阳明）生力军似的加入，也颇能得天才的学者们的信仰。但这两派都是假借经学以言理学，结果所谓“尊德性”的固然流于禅释，便是所谓“道问学”的也空疏无物。于是元、明二代成为经学史上的衰落时期，而东汉古文学便乘之而复兴。

上文“经学的三大派”说，自然是极其粗枝大叶的叙述；假使详

密的观察,不仅清代复兴的古文学同东汉原始的古文学不同,清代复兴的今文学同西汉原始的今文学不同,元、明的宋学与北宋的宋学不同;就是各派自身的流别,以及学者自身思想的变迁,都须加以烦琐的说明;但这决不是这简短的篇章所能容纳了。这三派的不同,简明些说,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,以“六经”为孔子致治之说,所以偏重于“微言大义”,其特色为功利的,而其流弊为狂妄。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,以“六经”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,所以偏重于“名物训诂”,其特色为考证的,而其流弊为烦琐。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,以“六经”为孔子载道之具,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,其特色为玄想的,而其流弊为空疏。总之,三派固各有其缺点,亦各有其优点。我们如果说,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、政治哲学以明,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、考古学以立,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、伦理学以成,决不是什么武断或附会的话。

最后还须附带说明的,就是:关于经学的分派,前人有采二派说的,有采四派说的,我个人觉得都不尽妥善。二派说可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为代表;它以为:“自汉京以后,垂二千年,……要其归宿,则不过汉学、宋学两家互为胜负。”^①其后江藩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、《宋学渊源记》^②、阮元《国史儒林传序》^③都取这说。其实他们所谓“汉学”,是专指东汉古文学,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。这样,不正是截去经学史的首尾吗?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前序说:“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,皆贾、马、许、郑之学,乃新学,非汉学也。”这种讥评的话也确有一部分理由。采取四派说的是近人刘师培。刘在《经学教科书》^④序例中说:“大抵两汉为一派,三国至隋、唐为一派,宋、元、明为一派,近儒别为一派。”这话也很有商榷的余地。宋、元、明固自为一派,两汉及近儒不都是含有互相水火的古

今文学两派吗？三国、隋、唐不就是古文学的支流吗？刘氏所以有这样的话，或者是强以时代分派的缘故。

二 经学史的重要性和它的分类

上文叙述经学的三大派，其目的不过在给读者以经学上的简明概念，以为进论经学史的预备而已。

中国经学研究的时期，绵延二千多年；经部的书籍，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著录，已达一千七百七十三部，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^⑤；但是很可奇怪的，以中国这样重视史籍的民族，竟没有一部严整的系统的经学通史。自然，经学史料是异常丰富的，广义的经学史或部分的经学史也不是绝无仅有；但是，如果说到经学通史，而且是严整点系统点的，那我们真不知如何回答了。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、刘师培的《经学教科书》第一册，固然不能说不是通史；但是以两位近代著名的经今古文学大师，而他们的作品竟这样地简略，如一篇论文或一部小史似的，这不能不使我们失望了。最近日人本田成之撰《支那经学史论》，已由东京弘文堂出版。以具有二千多年经学研究的国度，而整理经学史料的责任竟让给别国的学者，这在我们研究学术史的人，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惭愧了。

况且，就是撇开这种感情的话，而只就中国其他学术的研究而言，经学通史的撰述也是决不可少的。我们研究古史学，我们能不取材于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等书吗？但一谈到这三部书，《尚书》的今古文成问题，《左传》的真伪成问题，《周礼》是否实际的政绩的记载成问题。我们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，我们不能不论到《易》和《春秋》，但《易》的产生时期和思想来源成问题，《春秋》的笔削命意和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左氏》的异同成问题。我们研究古代民间文学，当然首及《诗经》，但《关雎》等篇的美刺成问题，《静女》等篇是

否恋歌成问题。最后我们说到古文字学的研究,则六书的起源,壁中古文的真伪,籀、篆、隶的变迁,无一不成问题,也无一不同经学发生密切的关系。至于将来比较宗教学、民俗学等的研究,那不仅应当探究《易》、《礼》的原始意义或背景,就是举世斥为妖妄怪诞而同经学有关的讖纬,也是绝好的资料。但是说,要研究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文字学等等的学者都先要向经学下一番苦功,不是太不经济吗?不是太不了解学术分工的作用吗?所以我说,在现在,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,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。因为它一方面使二千多年的经学得以结束整理,他方面为中国其他学术开一条便利的途径。

我这样热望着经学史的产生,或者会引起一般随俗者的误会。自然,我是十分清楚的,现在时行的口号是“打倒孔子”、“废弃经学”;但是我所不解的,是他们打倒和废弃的理由不够充分,不足以服顽固者的心。我原是赞成“打倒”和“废弃”的,但我自以为是站在历史的研究上的。我觉得历史派的研究方法,是比较的客观、比较的公平;从历史入手,那孔子的思想和经学一些材料不适合于现代,不适合于现代的中国,自然而然地呈献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不必高呼口号,而打倒和废弃的理由已了然于胸中。所以我们就是反对经学之学术史的研究,而只是立场于致用的、功利的观点,那经学史的完成也似乎是现代的工作之一。

经学史的需要既如上述,但在中国旧有的著述中,经学通史又这样异常缺乏;所以我们现在只得将它的范围放宽些,以寻求性质相近而较有价值的著作。这种著作,大概可分为三类:一、以经师为中心的,例如胡秉虔的《西京博士考》^⑥、张金吾的《两汉五经博士考》^⑦、王国维的《汉魏博士考》^⑧、江藩的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、洪亮吉的《传经表》、《通经表》,以及各史的《儒林传》或《儒学传》等属

之。这类著作的缺点:第一,每每是断代的记载,不能看见经学的整个趋势;第二,每每偏重个人的成就,而抹煞某一时代的全体表现;第三,甚至于仅有姓名而没有事实,或附以极简短的小传,大有“点鬼簿”的形式。二、以书籍为中心的,例如朱彝尊的《经义考》、翁方纲的《经义考补正》、郑樵《通志》的《艺文略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的《经籍考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经部,以及各史的《艺文志》或《经籍志》的经部属之。这类著作的缺点,大致同前者相同;虽然大多数不是断代,但不能表示经学的整个趋势却是一样。三、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,例如顾炎武的《石经考》、万斯同的《石经考》、杭世骏的《石经考异》、王国维的《五代两宋监本考》^⑨都是;在古代,选举、学校同经学也颇有密切的关系,所以《通典》的“选举门”、《通志》的《选举略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的《选举考》、《学校考》也属于这一类。这类著作的缺点,是每每罗致若干史料,加以排比,而不能显出这种典章制度在经学上的前因后果和其相互间的关系。总之,想真切了解经学的变迁,以上三类书籍只能作为辅助的或分门的参考资料,而仍有待于经学通史。因为这种原因,所以这样简略的皮著《经学历史》竟成为适应需要而另具价值的著作了。

三 皮锡瑞传略

在经学史这样需要而缺乏的时候,那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有一读的价值便了然可知了。现在在未谈到《经学历史》之前,请先介绍皮氏的生平和他的学术的大概。

皮先生名锡瑞,字鹿门,一字麓云,湖南善化人。他表示敬仰西汉《尚书》今文学大师伏生,署所居曰师伏堂,学者因称师伏先生。他早岁颇有经世之志,留意郡国利病。光绪戊戌政变时,因为提倡新式学校制度,大受顽固派的疾视,甚至于斥为乱党,交当地

地方官管束。皮氏治经，宗今文；但持论平允，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，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。他所著的书，除《经学历史》以外，还有《易经通论》一卷，《书经通论》一卷，《诗经通论》一卷，《三礼通论》一卷，《春秋通论》一卷，总称《五经通论》；《今文尚书考证》三十卷，《古文尚书疏证辨正》一卷，《古文尚书冤词平议》二卷，《尚书大传疏证》七卷，《尚书中候疏证》一卷，《史记引尚书考》六卷，《礼记浅说》二卷，《王制笺》一卷，《春秋讲义》二卷，《左传浅说》二卷，《孝经郑注疏》二卷，《六艺论疏证》一卷，《郑志疏证》八卷附《郑记考证》及《答临孝存周礼难疏证》，《鲁礼裨衿义疏证》一卷，《三疾疏证》一卷，《圣证论补评》二卷，《师伏堂笔记》三卷，《经训书院自课文》三卷，《师伏堂骈文》六卷，《师伏堂诗草》六卷，《师伏堂咏史》一卷，《师伏堂词》一卷等。他的著作内容，虽没有很伟大的创见，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；但学术门径很清楚，善于整理旧说；所以如《经学历史》、《五经通论》等书，对于初学者，真可称为“循循善诱”。他的著作，有师伏堂自刊本，多数由湖南思贤书局刊行，流传不很广。惟《经学历史》曾有上海群益书局铅印本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本。

因为皮氏是经今文学者，所以同时经古文学者都非难他。章炳麟在《文录》卷一《驳皮锡瑞三书》中讥斥得很厉害，陈汉章在《经学通论》^⑩附录中也表示着不满意。陈氏所批评的话多属于小疵或补正，现在撮录章氏的话于下，以见清末今古文学派的争辩。章氏说：

善化皮锡瑞尝就《孝经》郑《注》为之义疏，虽多持纬候，扶微继绝，余甚多之。其后为《王制笺》、《经学历史》、《春秋讲义》三书，乃大诬谬。《王制笺》者，以为素王改制之书，说已荒忽；然《王制》法品，尽古今夷夏不可行，咎在博士，非专在锡瑞

也。《经学历史》，钞疏原委；顾妄以己意裁断，疑《易》、《礼》皆孔子所为，愚诬滋甚。及为《春秋讲义》，又不能守今文师说，糅杂《三传》；施之评论，上非论疏，下殊语录，盖牧竖所不道。又其持论，多以《四库提要》为衡。《提要》者，盖于近世书目略为完具，非复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之侪也；其序多两可，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；锡瑞为之恒惑，兹亦异矣。……

章氏是现代经古文学惟一大师，平素说经，反对刘逢禄、宋翔凤、魏源、龚自珍，又反对康有为、廖平，凡近代经今文学者，没有不受他的讥斥；那他的呵诋皮氏为“牧竖所不道”，实毫不足怪。不过以我们第三者的眼光观察，除《春秋讲义》糅杂《三传》失了今文学者立场外，其余如主《王制》，以《易》、《礼》为孔子作，正是今文学所谓“微言大义”所在。至于引用《四库提要》，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，我们似应加以原谅。

我很惭愧，我所得于皮氏的生平，仅仅简略如此。他的生卒，他的师友，他的学术的传授，我竟无法查考。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，但不是没有回音，就是以“不知”答。当这样离乱的时候，大家救死惟恐不暇，谁能留意他们以为微末的事呢？据杨树达先生说，皮氏的弟子某君拟为他撰一年谱，我诚恳地希望着，希望他的年谱早日呈献于读者之前，而将我这简短疏略的小传舍弃掉。（按皮先生孙名振教授曾撰《皮鹿门先生年谱》，一九三九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，略见本书“附录”。）

四 皮著《经学历史》略评

我现在介绍皮著《经学历史》于读者，并不以为这本书是万分完善，毫无可议；在现在经学史这样缺乏的时候，无论如何，这本书是有一读的价值的。我们读这本书时，第一，不要忘记皮锡瑞是经

今文学者。因为他立场于今文学,所以他对于宋学是不满意的,更其是宋人的改经删经的方法;我们只要看他全书对于王柏的讥斥,便可了然了。又因为他立场于今文学,所以他对于经古文学也不表示绝对的崇信;他对于清代考证学的发展是相当地加以赞许,但他绝不以为是经学研究的止境。我们明了了这一点,则他所主张的“六经”断始于孔子,《易》、《礼》为孔子所作,以及其他排抑左氏、讥贬郑玄等等的话,都可以有一贯的解释了。第二,不要忘记皮锡瑞究竟只是一个经学家而不是史学家。因为他不是史学家,所以史料的搜集不完备,史料的排比不妥善,而且每每不能客观地记述事实,而好加以主观的议论。他这部书,假使粗忽的翻阅,似乎不能将经古今文学、宋学的发生、变迁、异同、利弊一一显示给我们。他不能超出一切经学的派别来记述经学,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帜之下来批评反对派。诚然,就经学说,他是没有失掉立场;但是,就史学说,他这部书就不免有点宣传的嫌疑了。我觉得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都不少,但是我不愿意在这简短的“导言之导言”中絮絮地谈论,更不愿因此给读者以批评的暗示。现在将这本书其他一切的优缺点让读者自己体味去,而只将我现在认为是荒谬的思想揭示出来。

皮氏作这本书的时候,正是今文学复盛的时候,因为时代发展的关系,颇有我们现在以为不对的地方。这在皮氏,自然深可原谅;但我们决不可因为重印这部书,而使这些荒谬的思想仍然流行着。

第一,我以为荒谬的,便是所谓“孔教救国”之说。孔子学说的真相究竟怎样;后世儒家所描写的孔子,后世君主所提倡的儒教,后世学者所解释的儒学,究竟是否是真的孔子,都是绝大疑问。在这步工作还没有完成以前,冒昧地将传统的因袭的孔教来治国,这

简直是鬼话。皮氏在第一章中说：“后之为人君者，必遵孔子之教，乃足以治一国；……后之为士大夫者，亦必遵孔子之教，乃足以治一身；……此万世之公言，非一人之私论也。”今文学者尊崇孔子，以为他怀抱着伟大的政治思想，这在我是可以相当承认的；但不论时代，不论地域，以他主观所得的孔教印象冒失地应用着来拯救现世，这不是很危险的吗？

第二，所谓“六经致用”之说。经今文派以孔子为政治家，以“六经”为孔子政治思想所托，这话似乎有一部分理由，但已经有商榷的余地。不过今文学者每喜更进一步，探求“六经致用”的史例，于是对于西汉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，愚而且诬地在赞叹着仿效着。皮氏也不免陷于同一的错误。他在本书第三章中说：“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，……其学极精而有用；以《禹贡》治河，以《洪范》察变，以《春秋》决狱，以三百五篇当谏书，治一经得一经之益。……汉学所以有用者，在精而不在博；将欲通经致用，先求微言大义。”这些论调，就我们现在观察起来，真有点非愚即妄。试问假使黄河决口了，你就是将《禹贡》由首一字背诵到末一字，你能像灵咒似的使水患平息吗？孔子和“六经”的相关度，以及“六经”和致用的相关度，不仅相去很远，而且根本上还是大疑问。所以现在就是研究经学，也只能采取历史的方法，而决不能含有些微的汉儒“致用”观念。

第三，所谓“纬候足征”之说。今文学家尊崇孔子为素王，所谓“无冕的帝王”；而且相信历代帝王欺罔民众的技术，以为帝王必有瑞征，于是孔子也有所谓“感生”，所谓“受命”，所谓“告成”^⑩，于是孔子不仅是政治家，而且是教主，而且是道士了。这些感生、受命等等的鬼话，多出于纬候，今文学家因为急急的为素王找寻证据，于是便冒失地相信纬候了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其次，今文学者以

为天人合一之说出于西汉,如《易》的占验,《书》的五行,《诗》的五际六情,《礼》的明堂阴阳,《春秋》的灾异都是;今文学源于西汉经师,为了拥护学说起见,自不能加以攻击,于是又只得容忍这妖妄的纬候了。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皮氏在第四章中说:“汉儒言灾异,实有征验。……天人本不相远,至诚可以前知;解此,则不必非光武,亦不必非董、刘、何、郑矣。”又说:“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,无所畏惮,借天象以示儆;……此《春秋》以元统天、以天统君之义,亦《易》神道设教之旨。……后世不明此义,谓汉儒不应言灾异,引讖纬,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岌岌矣。”这类话简直像算命卖卜者流的话,我们不能不大声的斥为荒谬。自然,我们不必像欧阳修似的,主张将一切纬候之说加以毁灭。它里面包含着原始民族的信仰与仪式,夹杂着古代的学术与经说,我们将它作为研究的材料,是非常可贵的;但居然奉为圣书,那便是大笑话了。

皮氏这本书自有其许多的优点,值得我们一读;更其是为经学史辟了一新途径,是值得我们后学者尊敬的;但是上所条举的错误,在新旧思想交替的时候,大有纠正的必要,所以我便如此率直地着笔了。

周予同

一九二八年六月

- ① 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“经部总叙”。
- ② 江藩于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之外,复撰有《国朝宋学渊源记》,分当时学术界为汉学、宋学两派。
- ③ 阮元《鞏经室文集·国史儒林传序》云:“两汉名教,得儒经之功;宋、明讲学,得师道之益;皆于周、孔之道得其分合,未可偏讥而互诩也。”盖亦分经学为两汉与宋明两派。
- ④ 刘师培撰《经学教科书》二册,第一册叙述经学历史,第二册叙述

《易》经学,其余《诗》、《书》等经均未成。光绪三十一年,由上海国粹学报馆印行;已绝版。(按今收入《刘申叔遗书》中)

- ⑤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:“《易》类一百五十八部,一千七百五十七卷;附录八部,十二卷。《易》类存目三百十七部,二千三百七十一卷(内四十六部无卷数);附录一部,一卷。《书》类五十六部,六百五十一卷;附录二部,十一卷。《书》类存目七十八部,四百三十卷(内十部无卷数);附录一部,四卷。《诗》类六十二部,九百四十一卷;附录一部,十卷。《诗》类存目八十四部,九百一十三卷(内八部无卷数)。《礼》类《周礼》之属二十二部,四百五十三卷;《仪礼》之属二十二部,三百四十四卷;附录二部,一百二十七卷;《礼记》之属二十部,五百九十四卷;附录二部,十七卷;《三礼》总义之属六部,三十五卷;通礼之属四部,五百六十三卷;杂礼书之属五部,三十三卷。《礼》类存目《周礼》之属三十七部,二百七十七卷(内三部无卷数);附录二部,二十四卷;《仪礼》之属九部,一百五卷;附录四部,二十二卷;《礼记》之属四十一部,五百五十四卷(内一部无卷数);附录四部,七卷;《三礼》总义之属二十部,三百一十卷(内一部无卷数);通礼之属六部,二百四十七卷;杂礼书之属十七部,八十七卷(内三部无卷数)。《春秋》类一百十四部,一千八百三十八卷;附录一部,十七卷。《春秋》类存目一百十八部,一千五百七十六卷(内十部无卷数)。《孝经》类十一部,十七卷。《孝经》类存目十八部,五十三卷。“五经”总义类三十一部,六百七十五卷;附录一部,三十六卷。“五经”总义类存目四十三部,三百四十九卷(内七部无卷数)。《四书》类六十二部,七百二十九卷。《四书》类存目一百一部,一千三百四十一卷(内十四部无卷数)。《乐》类二十二部,四百八十三卷。《乐》类存目四十二部,二百九十一卷(内四部无卷数)。小学类训诂之属一十二部,一百二十二卷;字书之属三十六部,四百八十卷;韵书之属三十三部,三百十三卷。小学类存目训诂之属八部,六十四卷;字书之属六十八部,六百六卷(内二部无卷数);韵书之属六十一部,五百三十七卷(内七部无卷数)。”按总计一千七百七十三部,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。

⑥ 见《艺海珠尘续编》。

⑦ 见《花雨楼续钞》。

- ⑧ 见《广仓学窘丛刻》。
- ⑨ 未写定。目见赵万里《王静庵先生著作目录》，见《文学周报》第二百六十七期（按今收入《王静安遗书》中）。
- ⑩ 陈汉章《经学通论》有北京大学铅印本。
- ⑪ 《春秋纬·演孔图》云：“孔子母徵在，游于大泽之陂，睡，梦黑帝使请己。已往，梦交。语曰：‘女乳必于空桑之中。’觉则若感，生丘于空桑之中，故曰玄圣。”又云：“得麟之后，天下血书鲁端门内，曰：‘趋作法，孔圣没。周姬亡，彗东出。秦政起，胡破术。书纪散，孔不绝。’子夏明日往视之，血书飞为赤鸟，化为白书，署曰‘演孔图’，中有作图制法之状。”《孝经右契》云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制《孝经》，既成，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，使曾子抱《河》、《洛》事北向。孔子斋戒，簪缥笔，衣绛单衣，向北辰而拜，告备于天，曰：‘《孝经》四卷，《春秋》、《河》、《洛》凡八十一卷，谨已备。’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，赤虹自上下，化为黄玉，长三尺，上有刻文。孔子跪受而读之，曰：‘宝文出，刘季握。卯金刀，在軫北。字禾子，天下服。’”夏曾佑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第一篇第二章第九节云：“上古天子之事有三：一曰感生，二曰受命，三曰封禅。……感生者，明天子实天之所生。受天命者，天立之为百神之主，使改制以应天。封禅者，天子受天明命，致太平，以告成于天。……孔子布衣，非王者；然自汉儒言之，则恒以天子待之。徵在游于大泽，梦感黑龙，感生也。天下血书于鲁端门，化为赤鸟（即文王赤鸟衔书之例），受命也。绛衣缥笔，告备于天，天降赤虹白雾，封禅也。三者皆天子之事，……此所以既比之以文王，又号之以素王欤？”（按夏书今改称《中国古代史》）

凡 例

- 一 《经学历史》有思贤书局原刻本、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及群益书局铅印本；本书即根据上述三种，参互校勘，以求是正；并施以标点，以便阅读。
- 二 凡本书原文引用他书，加以删节者，均覆按原书，加以删节符号。如页 17 引《庄子·天道篇》“孔子西藏书于周室，……往见老聃”。
- 三 凡本书原文避清帝庙讳者，一例改正。如页 43 公孙弘，原文“弘”作“宏”，今改正。
- 四 凡本书原文确知为刊印之误者，一例改正。如页 35“九流竞胜”，原文“竞”误作“兢”，今改正。
- 五 凡本书原文系皮氏偶误或偶遗者，一依原文，不加补正，而仅于注中加以说明。如页 57 引刘歆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“分文析义”，“义”为“字”之误，今不改。又如页 32“《公羊》有沈子、司马子、北宫子、鲁子、高子六人”，缺“子女子”一人，今不补。
- 六 凡本书人名见于正史者，于注中举正史之卷数，以便参考；其不见于正史者，从略。
- 七 凡本书引用清代人名，因注释成书时，《清史稿》及中华书局《清史列传》均未出版，故于注中仅举江藩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、阮元《国史儒林传稿》、《文苑传稿》之卷数；如不见于二书，则举钱仪吉《碑传集》、缪荃孙《续碑传集》及李元度《国朝先正事